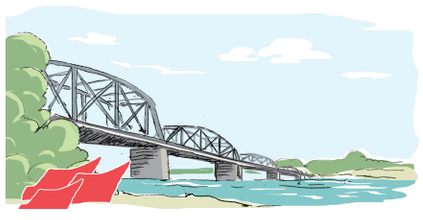
跨过鸭绿江的英雄老人

刘晓鸥



深秋的周末,我到家中看望师镇英老人。老人虽已是耄耋之年,但身板硬挺、声音洪亮,身穿一件红毛衣,显得庄重、宽厚和慈祥。我能结识这位曾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女战士,深感荣幸。因为我早已知道,她十几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经历过战争的考验。前不久,老人在女儿陪伴下,走进电影院观看影片《长津湖》,激动得热泪盈眶。老人入戏太深,对影片提出微词:“赴朝时,志愿军乘坐的列车有上下铺,这不符合她当年赴朝时的真实情况,志愿军坐的都是闷罐子车,没有床,没有椅子,都是席地而坐。”

老人在音乐学院附中工作的女儿告诉我,当年,母亲在朝鲜战场上,耳朵被美国飞机投掷的炸弹震聋了,当时没有治疗条件,左耳从此失聪,平时说话声音很大,有些话还需要“翻译”。老人一开口就是当过兵的人,没等我发问,就开门见山地说,你想知道啥,我就回答啥。可老人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从她的抗日革命家庭,那一段段血染的风采说起,瞬间把在场的人带入70年前的抗战烽火之中。

师镇英老人祖籍山西汾阳县,父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一个开明绅士。1937年,日寇侵占了山西,老百姓誓死不当亡国奴,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1938年,她的大哥和二哥一起参军,哥俩儿都上了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组织上派他们回到老家开展抗日工作,大哥和二哥都是地下党,都有公开身份作掩护。大哥在离村三四十里地的一所学校当教师,二哥开了一家面粉厂,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大姐是村妇救会主任,经常给大哥、二哥传递情报,站岗放哨。

那年,二哥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关押在大西北的大牢里。母亲带着她去探视,在监狱里,见到二哥遭五花大绑,绳子都快把脖子勒断了,母亲心如刀割,哭成泪人。后来,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二哥被释放,出来后又继续为党工作。他们全家共7个兄弟姐妹,一个不少都参加了革命。

15岁那年,二哥送她参加了八路军。当时叫人民剧社,后来改名叫吕梁剧社,也就是部队文工团,因是农村孩子,头脑简单,没听过多少革命大道理,就有一个单纯想法,大哥、二哥都是干革命的,她也应该跟着干革命。当时演出的节目多是连说带唱的小歌剧《血泪仇》《白毛女》,她个儿高,有点壮,没饰演过喜儿,光演黄世仁的娘。

在吕梁剧社呆了一年多,因为胡宗南要占领延安,组织上集中兵力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所以就解散了剧社,让同学们有家的回家。组织上想把她送到公校,可她惦记母亲和弟弟就申请回家了。家里也不太平,国民党和地主还乡团迫害老百姓,村里的人被迫躲进了山里,她刚到家就跟着母亲躲进大山,不幸又患了伤寒症,发高烧昏迷不醒,连母亲猝然病逝都不知道。可怜的母亲,临死也不知道二哥也已为革命事业牺牲了。那是1946年土改前夕,二哥领导农民“减租减息”,地主还乡团疯狂报复。一天夜里,还乡团来了几百人,把正在开会的二哥和其他同志堵在屋里,二哥他们手里没有枪,赤手空拳,竟被还乡团活活打死了,然后用汽油点着了尸体。大姐和三姐去收尸的时候,看到二哥全身被白布缠裹着惨不忍睹。大姐和三姐怕母亲接受不了就一直瞒着,所以母亲临死也没想到二哥早已不在人世了。大姐赶了一辆马车,跑了100里地把她接下山回家,可家里基本没有亲人了,原本是个大家庭,可为了抗日,一家人都出去革命了,是村里出名的“革命家庭”。现在,家里只剩下一个干了三十多年的长工和一个干娘,还有年幼的弟弟,她回家就成了弟弟唯一的亲人。不幸的事接连发生,敌人要搞强化治安,不断地抓人。村里想暗中保护革命家庭,但也保护不住。有一天,有人来到家里说要带她去谈谈,她只好跟着他们走。村长出面要带她去,说是去县城,走了二十多里路到了才知道,这是敌人的一所监狱,楼上楼下,充斥着被严刑拷打的人的哭叫声,被抓进来的理由五花八门,先抓进看守所再说。当时她还没有入党,只知道自己的哥哥是共产党。

开始过堂了。审讯的人问:“你为什么回来?”敌人知道家里已经没人了,她又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所以这么问。她回答:“父母都不在了,弟弟没人管!”敌人接着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她也害怕。虽然参加了吕梁剧社,但也没有人讲更多的革命道理,也没有书报可学习,就是农村孩子,小学四年级水平。敌人就反复问:“你为什么回来?你哥哥和你姐姐是不是共产党?”她想既然说不出来,也不能瞎说。第二次过堂,敌人拿来一个板子,放在旁边吓唬说:“你是不是共产党?说说你家里的情况!”她平静地说:“我父母都死了,哥哥们的情况不了解、不知道!”敌人要打她,她说:“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在监狱里关了四十多天,开始第三次过堂。敌人让她跪下,头抵着墙,敌人拿着熨斗式的铁板子,要往她的身上砸,她还是那句话:“打死我也不知道!”敌人没有再动刑,两天后,她被放出来了。

她们那儿有早婚的习俗,十六七岁就结婚了,邻居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她说不能结婚啊,家里没有吃的,她用牲畜饲料和村里人换点豆子,和弟弟忍饥挨饿,勉强度日。坚持了有一年多,无论多苦,她认定还是要参加八路军。她听说部队在贺龙中学征兵,就去报了名。征兵的同志问:“你为什么当兵?”她说:“大哥和二哥都是八路军,都为革命事业牺牲了,我也当过八路军,还被捕过,可我都挺过来了。”征兵的同志听完很受感动,就把她收下了。

大哥和二哥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出宝贵生命的共产党员。大哥是在解放太原时牺牲的,年仅32岁;二哥牺牲时,只有28岁,还没有结婚。如今,汾阳县烈士纪念碑上,刻有大哥和二哥的名字。她第二次入伍后,考上了西北军政大学的西北艺术学院,因为她有参加剧社的经历。1949年下半年,全国虽然解放了,可国民党留下很多潜伏特务和土匪,部队组织了南下文工团,她积极报名,被组织批准。部队大多是步行军,也坐过火车。大概走了两天,走到四川成都,她到了军管会的文工团二队,成了一名女文工团员。她随部队到了重庆,有些人服从命令去了阿坝剿匪。文工团演出的节目是《刘胡兰》《白毛女》,她演刘胡兰的母亲、黄世仁的母亲,在重庆演刘胡兰母亲上坟的戏,她唱得入戏了,哭得下不了台。

1949年12月,她正式入党,刚满18周岁。她入党算是早的,因为有前段的历史,有家庭的背景,再加上她的表现。1950年,她老伴儿所在部队的战斗文工团到成都招生,要求是党员,只要一位女同志,她完全符合条件。就这样,她和老伴儿就在一个部队工作了。

1951年年底,她就赴朝了。那时上甘岭战役还没结束,他们的任务就是下坑道,代表军首长慰问志愿者战士,文工团战友两三个人分在一个坑道,就在坑道里为战士演出节目。刘胡兰的妹妹和她是一个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她给受伤的战士献过血,当时的战役是攻打老土山,队长带着她和几个战友刚出坑道,敌人的飞机就扔下炸弹了,她的胳膊被炸伤,左耳被震聋,永远治不好了。她为被炸弹皮崩伤了的战友包扎、喂水,战士一个挨着一个,等候命令,一呆就是两三天,也不脱衣服。刚去朝鲜时经常闹肚子,也没有办法处理,没有裤衩,就是一条军裤,方便时就找一只小桶。那时候的艰苦,可不是现在人们能想象得到的。比如伙食,坚守在坑道里,就是吃压缩饼干,后来能吃到馒头和米饭。炊事员每天天不亮,就要到外面接坑道里的水来做饭。

老人于1953年回国,1956年部队大批转业时,被组织分配到天津工作。结婚时,她已经29岁,是正排级,老伴儿是副连级。刚到天津,就搞农村合作化,1957年,她被下放到南郊南马集,那儿有戏校的、梆子剧团的,人家周六就回市里的家了,她不回家,仗着身体健康,和村女书记一起工作。“我啥农活儿都会干,干得死心塌地。老伴儿当时因关节炎离开部队,到陕西话剧院任院长,为了和我团聚,放弃了自己理想的工作。”老人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我找到了自己心爱的老伴儿,和我一辈子同甘共苦。”

本版题图 张宇尘

乡间夜路

康健

现在人们已经很少走夜路了,乡村日益与城市趋同,道路宽畅,灯光明亮。在农村很多地方,即使偶尔走一回夜路,也很难说是披星戴月,踽踽独行。无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像这种情况都无一例外,景观照明让夜晚恍若白昼,有时比白天还要迷人。

四十多年前的少年记忆中,像是黑白默片一般,甚至缺乏明亮的底色。五彩缤纷的生活属于城里人,乡里娃基本上与之无涉。那时,父母常年在外地教书,父亲是长子,我是长孙,为了陪伴爷爷奶奶,于是把我留在农村老家作“资深留守儿童”。这段时光有点长,十几年的时间长不长?在这段农村生活中,印象中好像很少有明亮的灯光,只有或明或暗的天光。天光映照之下,当地的人们大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夜色深沉时,天光也十分黯淡,地上被无边的黑暗笼罩。只有在简陋的公社小街上,才有几盏昏黄的吊灯,这已是那个年代最时兴的夜景,一般农家点的都是火苗如豆的煤油灯。

其实,从当年老家的情况来说,很多人家到了晚上全家通常只舍得点上一盏煤油灯,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黑着灯说话,或者是在明灭闪烁的灯火中做事。家里有上学的学生,也是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光线严重不足,灯火摇曳不定,借光就需要凑得很近,免不了会火燎眉毛或眼睫毛,经常是一呼一吸引来了油烟,熏得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

在明亮的灯光下,一家人凑在一起说说话,这在当年我们的想象中,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啊,现在的人们对此完全无法想象。至于路上、野外,到了晚上都是漆黑一片,哪里有什么路灯,大家也知道那是城里才有的光景。日常生活中,经常是隔不了多久,就要人工推石磨熬到后半夜,又累又困。要是打碾米谷的话,还有个先来后到,就要天不亮起大早,抢占村头那盘唯一的石碾,十分辛苦。到了深秋季节,乡下的天色好像要黑得更早一些,暮色苍茫之中,趁着拖拉机翻耕庄稼地,很多家庭全员出动捡拾庄稼根茎当柴火烧。

在很多个傍晚,我都会在乡村道路两边的树下草上,来来回回扫拾树叶地衣,乡下人们在外面一天的劳作大都以此作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黑暗或半黑暗中进行,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始终抱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在一盏明亮的有着灯罩的煤油灯下读书做功课,这盏灯不是农村老家那种用废旧墨水瓶制作的简易煤油灯,而是可以在点亮很久以后它的灯罩也不至于因高温而炸裂。当这个理想得以部分实现的时候,那已经是我考上高中,随父母到县城生活以后的事情了,这样的好日子总共没有超过4年时间。

那个时候,县城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有规律无规律间歇性停电是常有之事,让人不胜其烦。只是学习不能中断,尤其是高考复习不能中断,停电时就得继续点亮那种带有灯罩的煤油灯,但是灯亮得久了,温度一高,隔三岔五灯罩就会爆裂。总之,那时在农村,大家都习惯了摸着黑干农活,摸着黑做家务,更不要说摸着黑赶路,都是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常态。连家长骂孩子都要说“不是省油的灯”“瞎子点灯白费油”,往往与现实生活的情境高度相关,是真实写照,也是对光明的期盼。

所有这些,要是同现在的孩子讲起,他们是全然不能理解的,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孩子,当然也不会有类似的生命体验。一些人即使有过近些年农村生活的经历,但还是很难同以前的农村同日而语。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北农村,高原的晚上那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天地一片漆黑,屋外是黑的,家里也是暗的,在无边的夜色里,有一颗少年的心灵在闪闪发亮。满天星光时,地上就会有光亮,这会引起少年无边的遐想。

我家住在远离村落而靠近沟边的一个偏僻之地。无边无际的原野,中间是一条细长的灰白乡间小路,两边是黑压压的庄稼地。风吹过,如海边或者山林里的阵阵涛声,感觉像是藏有伏兵百千,坏人十几,野狼三五。不过,这还不是最为凶险之地。小路尽头,是下沉的沟沟壑壑的开头,在黄土地貌上叫做沟畎,那里时常有各种野物出没,狼狐之类都不鲜见。白天时路上人少,走过此处,大人都心里发毛,有意无意手上都要带件家伙,更不要说到晚上了。所以,无论白天夜晚,小孩子们经过此地,一般都是成群结伴地走,起哄壮胆。

我现在已经忘了是什么原因,当年也有过几次独自走夜路的经历。有时我是喊叫着,高声唱着歌,脚下却是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飞奔,但心里是虚的,两条腿是软的。乡间土路一般都不够平坦,通常是那种驴脊梁路,中间高两边低,有些坑坑洼洼,走在上面高一脚、低一脚,熟悉了倒也不会摔跤,但不熟悉就不好说了。特别是在有些时候,一旦心底生了怕,恐惧上了脑,脚底稍有磕绊,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双腿发软再也站不起来。到了那个时候,不弄得魂飞魄散才怪呢。

几个小伙伴走夜路,都会抢着走在前头,谁也不敢落在后面。要是有谁一不留神被甩在最后,那是连后脊梁都会发凉,“腿”不由己。所以,一帮小伙伴晚上走路,都是越走越快,没有人催,反而很自觉地跑得飞快。小孩和大人一起走夜路,年龄小些的就紧紧抓着大人的手,大些的孩子就赶紧往前跑,谁也不敢在后面走。不像在白天走路,小孩子一边走路,一边玩耍打闹,走走停停,磨磨蹭蹭,有时回家耽误时间耽误事,受家长责骂或者处罚是常有的事。

记得有一回独自走夜路,竟然被逼出了气壮山河的感觉。那次是到公社戏园子看露天电影,离家比较远,这可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化生活。结果一高兴,只顾独乐乐,忘了众乐乐,电影散场时,不知道怎么就落了单,同其他人失去了联系。比不得现在,有手机可以随时联系,处处皆是方便。像发生晚场电影落单那种情况,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郑重对待,虽然条件有限,但还是要提早做些准备。

我先是在街上供销社的商店里,用压岁钱买了几个大炮仗,好像是花了1毛钱,买了4个大炮仗。那时候钱可真值钱,1毛钱对于小孩不是小钱,添上2分钱就可以买两本作业簿。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花这笔钱实属万不得已。在商店明晃晃的电灯下,我狠了狠心在柜台上拆了两个大炮仗,把里面的火药倒出来,小心翼翼地装填进自制的玩具火药枪里。根据少年有限而可靠的经验,这个剂量不算小,是平时剂量的4倍,但仍在安全可控范围内。要不是那天晚上情况太复杂、太特殊,这个用量我可舍不得,放到平时还能多打几枪呢。然后,我把火药枪的撞针撸起,枪口向前小心翼翼地端着,紧赶慢赶踏上回家的路。

暗夜里,迷离天光下的乡间土路上,一个少年穿越原野时凌厉地喊叫,他拔脚快速飞奔的单薄身影,曾经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定格。那个晚上,没有人知道这个少年到底经历过什么,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是少年走过的一程夜路,以及经历的一段心路。这个场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距今已有四十多年的时间。在现代都市明亮如昼的灯火中回忆往事,无论从所处的时代场景而言,还是从现时自己的心境来说,都不大可能再回到从前了——而在说出这些的时候,似乎也已迥异其趣了。

春季的柳笛(外三首)

金同悌

春季暖融融地落脚
就想起童年的柳笛
在窗外河滩上
稚气地唱着唱着

每天唱够了
把笛儿放进河里
看它慢慢漂远
明天再做新的

回家时,母亲告诉我
她听见笛音
一天比一天好听

就问
我放漂那么些笛儿
到哪里去了呢

母亲说会漂得很远
成为河里潺潺的歌谣
——伴你一生

斑 鸠

雪后天气冷冽
斑鸠孤立枝头
身边没有一片叶子

暖风已在路上
它凝望天空抖动羽翼
寻问飘来飘去的云

直到
又一只斑鸠飞来

慢慢走

在野外灌木林草地上
慢慢走

慢慢走

把心情交给脚步
有什么话
自己和自己说

和灌木林长在一起
和芳草地长在一起

回家的路不近不远
——慢慢走
——慢慢走

惊蛰过后

惊蛰过后——
就等雷声走遍乡野
就等冷寂的河湾里有船
就等邻里们笑:下雨了
就等雨水里莺飞草长

南去的雁阵还没归来
云絮里裹着未尽的料峭
亲人们在短信里说阳气,该回升了呢

雷声在一天晚间骤起
雨阵滔滔地喊话
风脚在窗前过来过去
父亲的烟袋浓烟很呛

雨停了,云散尽了
屋里安分一些
等雨的那种心情
做成天晴时放飞的纸鸢

杏花村在远方
杏花酒在远方

摇响春天的铃铛

张承斌

只那么轻轻一摇晃,声音清亮
仿佛吹响了春天的集结号
瞬间传遍千万里祖国山河
江南田畴,塞上阡陌
这些精灵由睡梦中醒来
个个舒腰展臂,从远近处
从高低处、深浅处
溪水匆忙,日夜奔走相商
虫鸟亮起歌喉,唱响春之赞歌
十万朵桃花涂抹了春天的面容
金黄的地毯由南向北一路铺展
日子如此清爽、鲜亮
我们踮起脚朝向远方
目光抚摸着春天的翅膀
在轰轰烈烈的农事中
把又一年的希望,往高里
拔了又拔

文艺周刊

第二八六四期

72 寓教于故事中

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就算顺利,新教室也要假期里才盖得起来,今天不上课可以,除非剩下的半学期不上课也可以。而这显然是不可以的,这里是学校不是茶馆,是讲规矩讲纪律的地方,不是想聚就聚想散就散的。但陆建芬还是给了尔布克哈 、给了孩子们一个乐意接受的答案:要不先不上课,我们开个故事会吧。

北宋时,洛阳有个人叫程颐,学问不是一般大。杨时听说后找上门,想要拜他为师。当他和朋友来到程颐家,天在下雪,程颐在屋中睡觉。朋友给了两个建议,叫醒老师,或者改天再来。叫醒老师不礼貌,改天再来,他又等不及了。杨时做出选择,等,安安静静站院子里等。这一等杨时就成了“白眉大侠”,因为程颐醒来,院中已积了一尺的白雪……

雪花都飘到洛阳去了,还是所有寒意都凝结成霜,洒落在了杨时宽阔的眉梢?一场雪覆盖了另一场雪,一个场景虚化了另一个场景。在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学生们忘记了自己,寒冷忘记了寒冷。讲完“程门立雪”陆建芬又讲起 “凿壁偷光”,讲起“映月读书”……

每个故事都以一个问题作为结尾。听了“程门立雪”,你有什么体会?她点名让阿木尔补作答。

阿木尔补站起身,把衣角往下拉了拉:洛阳的雪比二坪下得大。

教室里笑成一片。陆建芬让笑得最夸张的尔布克哈说出他的答案。尔布克哈说:想学习就要不怕吃苦。讲完“凿壁偷光”,第一个被点名的还是尔布克哈。问:要是匡衡凿穿了你家的墙你会怎样?答:我家竹笆房到处漏光,用不着凿。

光打“精神牙祭”也不行,天最冷的时候,老师在屋外空地上生一堆火,等火堆让手指不再僵硬,让身子挣脱了冰冷的束缚,才又进入教室,进入又一段教学时光。老师在用心讲,学生在认真听,雪在努力下。雪落在黑板上,不一会儿就化了,字就花了,老师就说,娃娃们抓紧记啊,跟雪比一比,看它快还是你们快……

日子一天天过去,砖墙一天天长高。然而,不怪别人,实在是因为海拔太高工资太低,实在是因为外面的人长着和二坪人不一样的胃,临近封顶,徐世林带上山来的人7个人只剩下3个。天上少一颗星星可能没人在乎,但工地上每少一个工匠,大家比自己缺了一个牙齿还要心疼。帮工的村民心气不似先前足了,今天这个迟到明天那个早退,工地上变得冷清起来。再这样下去会搞出来一个半拉子工程,陆建芬把从牙缝里腾出的腊肉全部搬上饭桌,李桂林则闷下一杯酒,向徐世林拍了胸口:你在山上一天,我打一天下手,绝不拉稀摆带(方言,不应付之意)。

156 减重扩额解“钱荒”

红楼与中华名物谭

罗文华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南宋诗人林升的名诗《题临安邸》。南宋小朝廷并没有接受北宋亡国的惨痛教训而发愤图强,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政治上腐败无能,达官显贵纵情声色,寻欢作乐。《题临安邸》一诗倾吐了郁结在广大人民心头的义愤,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但这首诗同时也透露出当时临安一带的繁华景象。南宋的版图虽然较北宋大大缩小,但其所占东南一隅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北方人民由于不愿受女真贵族的压迫奴役而纷纷南迁,不但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而且也增加了劳动力,南方社会经济因此得以高度发展。

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使货币需求增大,金属货币短缺,出现了严重的“钱荒”。南宋张端义《贵耳集》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京下忽阙见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会之(即宰相秦桧)呼一镊工(理发师)栉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谕云:此钱数日间有旨不使,早用之。镊工亲得钧旨,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间,京下见钱顿出。”秦桧不惜大钱小花,故意利用理发师之口传播现行货币即将停用的虚假消息,让人们都赶快把存款拿出来花掉,暂时解决了市面上的“钱荒”。

南宋时期大量发行纸币、铁钱,还铸造过代用货币“钱牌”。在货币减重贬值的大趋势下,铜钱也大规模扩额,铸行了折二、折三、折五、折十、当二十乃至当百等大钱,以折二居多,与北宋时期以小平铜钱为主的情况大为不同。这也是现今古钱市场上南宋小平铜钱的价格明显高于南宋折二铜钱的历史根源。近些年,南宋钱在杭州一带的价格相对高一些。杭州曾经是南宋的都城,杭州人可能多少有些南宋文化情结,所以比较喜欢搜集南宋钱,价格也容易炒得高一些。江南的钱币收藏者到北方出差旅游,常到北京的潘家园、报国寺、马甸,天津的沈阳道、古文化街、鼓楼等处,专门搜购南宋钱币。

南宋学者洪遵所撰《泉志》,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钱币学专著。该书著录钱币348品,在古代货币断代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对中国钱币学研究影响甚大。日本、朝鲜、安南等钱币,也是该书最先载录的。难能可贵的是,洪遵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于绍兴十九年(1149)撰成《泉志》后,对铸钱事业更加关心,建言献策,“因面对,论铸钱利害,帝嘉纳之”,为扭转“钱荒”加剧的局面作出了努力。

3 应对自如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现时正是白色恐怖猖獗时期,敌人什么阴谋都用,不能掉以轻心。唐明安又以怀疑的目光,看了一眼和自己同坐在汽车后排的张象鼎,而张象鼎冲他一笑,并点了点头。张象鼎是我党的老秘密工作者,唐明安的疑虑和担心,他心知肚明,但碍于有司机在场,不便做什么解释,所以只能是对唐明安点头一笑,这是给唐明安一个让其放心的神态和动作,促使他的心情安定下来。张象鼎的动作行为,似乎是让唐明安稳定了心态,他一言不发地坐在汽车里,将目光投向车窗外,观赏起天津市区的景色。

汽车在市政府大院内停下来,张象鼎让司机把唐明安的行李拿到自己的办公室。司机走后,张象鼎把办公室的门关好,走过来握住唐明安的手,热情而激动地说:“唐明安同志,我叫张象鼎,总算把你安全地接到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是,既要把你安全接到,还得把你平安送走,任务我已经完成了一半儿,下一半儿任务的完成,还得需要你的配合。”唐明安也很激动地说:“需要怎样配合,我完全听你的,只是有些疑问,我想提出来问清楚。”张象鼎马上反应过来说:“你是想问在组织安排接你的程序中,没有交代过要到天津市政府,怎么现在把你拉到了这里呢?事情是这样的,我接到上级指示,今天中午到码头接你,并负责将你安全地送出去。当我正要出发时,市长来电话找我,给我看了蒋介石发过来的关于你的两封电报。”唐明安听蒋介石拍来的电报关乎自己,立刻问道:“蒋介石发来关于我的两封电报,什么内容?”

张象鼎一看唐明安的神色,知道他对自己进入市政府的处境心中无底,便说:“明安同志,请不必担心。蒋介石的电报,对你的身份掩护和我接你的行为,都是十分有利的,一会儿你一看便知。只是按照电报的要求,和我党安排你去的地点有悖,这一点,一会儿和市长见面谈论起来时,你要想好怎样应对。”接着,张象鼎将两封电报的内容,告诉了唐明安。

张象鼎和唐明安两个人正说着,市长派人来叫他们马上去他的办公室。一进屋,市长就主动迎上来和唐明安握手,唐明安也热情地伸出手握住了对方。市长说:“唐先生年轻有为,蒋主席果然有眼力。”市长握着唐明安的手,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唐明安假装没听明白市长的话,口中说:“晚生不认识蒋主席,倒是从内心十分感谢市长对晚生的关怀,竟然派张科长亲自到码头接我,我向您,也向张科长致谢了。”说完,向市长和张象鼎各敬了一个军礼。那神态动作显得精明利落,把一个军校毕业青年的精气神儿,彰显得十分到位。